

社会主义与国家建设

——基于中国的立场和实践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国家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发展的核心主题。中国的发展, 既要建设社会主义, 也要追求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序列中, 现代化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与基础, 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维度就是建设现代国家。然而, 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的国家建设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维度展开的, 其立场与在现代社会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国家建设有内在的冲突, 结果导致国家建设的扭曲。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发展路径发生深刻变化, 将社会主义的实践建筑在现代化发展基础之上, 并创造了全新的中国进步与发展。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因此回到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中来, 并得到有效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中国全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与保障。

关键词: 社会主义; 国家建设; 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09) 06-000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整整 60 年。现代化、社会主义以及国家建设是这 60 年历史的核心主题。现代化使得中国的发展逻辑告别传统, 社会主义使得中国的发展目标超越历史, 国家建设使得中国发展进程落实于中国自身。国家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使命, 但其在各国的展开, 则取决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理想与目标, 从而各具特色。到目前为止, 基于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展开的现代国家建设, 主要在两种社会形态下展开: 一是资本主义社会, 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成, 由这个社会形态所形成的现代国家建设模式也就成为一种标准模式。从理论上讲,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而其现实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与矛盾, 因而,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在现代国家的基础上展开。但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 社会主义实践主要出现在现代化尚未完全展开的落后国家。于是, 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就自然地把社会主义的追求与现代国家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 崇高的使命和目标虽然赋予国家建设以新的境界, 但社会主义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理论逻辑和落后国家以社会主义为取向展开的国家建设的实践逻辑之间的错位, 也给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建设实践带来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近 90 年的探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发展, 在经历了这些问题和挑战之后, 探索出了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建设之路, 并成功地付诸实践。本文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发展历程, 探究中国是如何逐步地将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融为一体,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之路。

基金项目: 教育部研究基地项目 (05J17Z1224)

作者简介: 林尚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研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一、现代国家建设：马克思的理论

尽管有人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系统地研究过国家^①，但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关于国家的思想和理论还是相当系统和全面的。实际上，法与国家是马克思早期研究的中心论题，而且其视角与方法主要是法学与政治学。正是在这个时期的研究中，马克思形成了对现代国家的基本看法。虽然其中的不少论点深受黑格尔影响，但其基本主张却是在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中形成的。在现代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也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是现代国家产生的历史前提，但关于现代国家的本质，马克思则与黑格尔完全不同，认为现代国家不是绝对理念的产物，而是现实历史运动的产物，其本质就是民主。^②

国家建设是针对现代国家而言的。现代国家产生于现代化的历史运动之中，其历史与理论前提是共同的，就是人的独立与解放，即从人对人依赖的“共同体”的人解放为独立自主的个人。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人的交往方式，从而决定社会的组织方式。个体的独立自主孕育出现代社会，即市民社会，其表现形式就是：基于个体的自主独立，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并成为决定国家的力量。于是，国家就从原来全面统治社会的独立力量转变为社会用于维护自身的内在统一和运行秩序的保障力量。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③所以，现代国家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产物，其形成、完善与巩固，既取决于其满足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程度，也取决于其所服务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水平与程度。这决定了国家建设是融合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之中，既体现为国家自身制度体系的完善与成熟，也体现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其实质是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从而成为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精神体系相互统一的有机共同体。

马克思把历史上的国家分为两种形态：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认为“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构成国家的内容，其他的领域都包含在内，而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④。“非政治国家”就是“现代社会”，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国家是以现代社会的出现为前提的。从人类历史运动来看，“现代社会”可以看做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但从其在西方社会最先产生的历史节点来看，“现代社会”与资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1844年，马克思在其草拟的关于现代国家的写作手稿中，将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⑤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这意味着现代国家建设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面临的基本政治任务。

从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著作的手稿来看，现代国家建设在政治层面上所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包括人权、宪法、代议民主、权力分开、立法权与立法机构、执行权与行政管理体制、国家结构形式、司法权与法律体系、民族与人民、政党与选举。手稿的最终落脚点是：“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⑥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来反观这早期的理想目标，可以把这个落脚点定位为“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而斗争”。因为，我们从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现代

① 参见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实际上，马克思有过想系统研究国家的计划。1844年马克思曾草拟过一份关于研究现代国家的计划手稿，后来由于研究取向的变化，马克思没有将这个研究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从这份手稿来看，马克思试图从政治的角度研究国家，但很快就开始转向经济研究了，并认为政治的问题必须通过经济的研究与分析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因为政治是决定于经济的。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7—2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3页。

④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7—294页。

⑤ 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⑥ 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国家的批判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其对现代国家的异化的深恶痛绝。这种异化在法国的体现就是:基于现代社会而产生的现代国家,反过来成为全面窒息现代社会的强大力量:“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础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① 马克思把这样的国家力量看做是缠绕社会并使其窒息的巨大蟒蛇:“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② 鉴于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想法:“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③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④,从而将社会从国家奴役下解放出来。所以,马克思欢呼巴黎公社的诞生,认为公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⑤。马克思说:“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噬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⑥ 同时,“公社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⑦。

巴黎公社提供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成为马克思构想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之后的国家与国家制度形态的基本范本。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制度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而在西方,现代社会体现为资产阶级统治。当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了,国家制度就必然发生变化。他说:“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消亡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⑧ 显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结束之后是否存在国家建设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从他强调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公社制度的欢呼来看,依然存在着国家制度建设的问题。恩格斯解释认为,无产阶级此时“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 Gemeinwesen [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⑨ 列宁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恩格斯的这段分析“大概是所谓‘反对国家’的最精彩最激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2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页。

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2页。

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页。

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16页。

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77页。

⑦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2页。

⑧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21页。

⑨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页。

烈的一段了”^①。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代国家建设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而在社会主义范畴中,有国家制度建设问题,但不是从国家本身出发的,而是从专政的需要出发的,而且其建设的历史取向不是为了国家本身,而是为了社会本身,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度到什么程度。”^②从这个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范畴中,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与巩固过程,但从根本上讲没有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与使命,相反,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的发展,消灭国家,使社会完全成为自由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与壮大的过程,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应该体现为社会不断获得解放和自主的过程。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无疑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历史逻辑基础之上的,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的定位,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为前提,以充分现代化发展为基础的。因而,当落后国家不能从本国的实际历史方位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来把握这个原则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就可能成为它们现代化发展以及迈向现代国家进程中的樊篱。

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中国的国家建设路径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正式展开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标志着传统帝国体系的彻底崩解,因而,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社会基础之上重构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政治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中,中国确立了民主共和,开启了现代国家建设。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中国,不论是传统帝国体系的崩解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开启,都不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对中国传统社会和制度全面冲击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及其背后的现代化历史运动,都不是内生的,而是外来的,是中国社会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运动的反应和选择。现代化的历史运动是具体的,不仅体现在各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上,而且也体现在人类生产、生活和观念的基本形态的变化上,在体现当下的发展的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当中国正式开始从现代化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正走向全面的危机和衰败,与此同时,力图克服和超越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则蓬勃发展。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一开始就面临着路径选择: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入,还是从发展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偏向后者。辛亥革命前后,弥漫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阵营中的思想和主张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思想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如果说“康有为在西方资本主义阶段产生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乐园的大同空想;那么,孙中山却是在帝国主义诞生时代,接受和提出了避免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变革或革命的共同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并与生俱来地承担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革命是一回事,而革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对于前者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与目标,是一套价值体系与原则,在理论上,它可以是现代化的前提,也可以是现代化的后果;对于后者而言,社会主义则是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实践,是要建立的

①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页。

③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

国家与制度，而且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旦展开，就直接面临着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化为基础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实现现代化。显然，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这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落后国家要实践社会主义，就必须将现代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实践放在一起同时进行，而在理论中，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即建筑在现代化发展比较成熟的基础上。这种紧张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国家建设实践中并不突出，因为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治自由资本主义之病、补自由资本主义不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现实运动的逻辑起点和发展过程本质上还都是资本主义。然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新型的社会与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因而，其现实运动的逻辑起点和发展目标在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那种能够导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崇高的社会发展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很快就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张力。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掌握国家政权，进而领导和推进国家建设的。作为革命党建设国家，一开始就面临着两大行动逻辑的选择：一是与生俱来的革命的逻辑，即为理想而行动的逻辑；二是革命后的建设逻辑，即按规律而行动的逻辑。决定这种选择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就明确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建设一个新国家，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而且也是现代化的。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① 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②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把工业化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追求的国家建设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二是社会主义。前一个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但这里丝毫没有提及这个过程，于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前提与途径。

事实上，对于“现代化”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是接受的，并用于表述国家建设的基本目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了现代化的可能与必要，他说：“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④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新中国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将工业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三个概念组合在国家建设目标的表述中：“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②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6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①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来看,现代化不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发展过程,仅仅是工业化国家的表征。而这里所说的工业化实际上是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以及现代工业技术在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中的普遍应用。这样,在具体的发展实践中,现代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也就自然地成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前提与条件。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明确了这种逻辑关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②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中,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也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决定因素。

然而,今天看来,当我们把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中抽象掉,用简单的工业化目标和任务来代替时,我们也就失去了科学把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把一切的发展都寄托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与行动逻辑就无法真正地从革命的逻辑转变为建设的逻辑,因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基础;而在革命的逻辑中,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使命是要在中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转变为现实,而不是通过建设和发展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因而,其取向必然宏大而理想,即以彻底超越资本主义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为使命,从而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从理论上讲,这种社会主义符合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方向,是科学的,而其实践的展开是建立在比较成熟的现代化基础之上的。然而,中国是一个现代化尚未全面展开的落后国家,要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革命的逻辑下,这种张力不是通过理想回归现实来缓解的,相反,是通过让现实无条件地服从理想来释放的,其结果必然使国家建设发生扭曲。

辛亥革命之后开启的国家建设就是现代国家建设,主要围绕着两大轴心展开:一是主权,二是人权。围绕着主权,国家要实现其外部的独立与内部的统一的有机结合;围绕着人权,国家要建立一套旨在保障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并实现自身的全面制度化。人类历史发展表明,这一切都必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并以现代化的发展为基础。所以,有学者认为,现代国家建设从本质上可以被看做是现代化的政治维度。^③从国家建设的行动过程来看,实现国家独立和内部统一是国家建设的首要使命。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主要是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完成了这个使命。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建设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的建设上来。历史确实呈现了这种转变。

但是,这种转变最终不是从现代化发展切入的,而是从落实和实践社会主义理想切入的。由于我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④从实践社会主义理想切入而展开的国家建设必然发生严重扭曲,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不在人民民主,而在阶级专政。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在于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然而,这种基于革命而形成的人民解放,更多地体现为阶级的解放,即劳动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阶级解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与基础,

① 周恩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载《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7页。

③ 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④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载《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118页。

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种解放必须与阶级专政有机统一。没有阶级的专政,也就不可能有阶级的解放。而且,在理论上,这种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形态。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①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后,不论出于人民解放的目的,还是出于政权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需要,国家建设的实际逻辑起点是阶级专政,从而在有意无意中拓展了国家的暴力性和统治性。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实现生产力的新解放、新发展,并使社会真正地从国家的驾驭中解放出来。然而,在中国的实践中,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大跃进”的失败,现代化受挫,经济与社会的力量不但得不到发展,相反,对国家有了更大的依赖;而现代化受挫激化出来的矛盾则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于是,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视为巩固国家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出路。这样,国家建设不仅得不到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支撑,而且还在不断强化的阶级专政中被渐渐扭曲。

第二,国家建设的行动依据不在宪法,而在党的纲领。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示,中国革命的使命就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②。为此,毛泽东从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方面构想了未来的国家建设,其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就意味着国家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现代政治文明中,社会发展对国家建设的要求最基本也是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宪法,这决定了国家建设的最基本依据就是宪法。1954年的宪法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明确的规定,如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等。与此同时,宪法也在政治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以保证国家的组织、制度与管理能够与之相适应,如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不仅要靠国家机关的力量,而且要靠社会的力量;强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以及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等等。这些规定既体现了社会的共同意志,也体现了国家建设的目标取向,因而宪法是国家建设行动的最合法、也是最基本的依据。然而,实际展开的国家建设,不是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进程出发的,而是从实践社会主义理想的进程出发的。在冷战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竞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发展竞赛的催化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进程大大超越了现实条件,完全从理想出发,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在这种情势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超越各种既定的规定和规范,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和提供的可能,自行其是地发展。由于这种发展需要强大的动员、组织和整合,所以,很快就被其主导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体系和力量所吸纳,结果,国家建设被纳入了党的建设的范畴,用党的权力替代国家权力,并用党建的原则和逻辑来建设国家。这样,人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就渐渐地看不到宪法所规定的那个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感受到的主要是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以及党的领导行动。

第三,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不在健全国家制度,而在打碎国家机器。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使命就是要打碎国家对社会纠缠和统治,让社会解放出来,回到社会自身。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确立的过程,不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而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制度形态来代替的过程。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国家建设,一方面表现为对旧的制度体系的摧毁,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党的领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

导为核心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单位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与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建设的核心取向是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因而,更多地从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出发,而不是从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出发。当用于指导制度建设的价值与原则的背后理论是理想的、甚至是领导人的意志的时候,制度建设就变得十分随意,既可随时建,也可随时换,一言可以定制,也可以废制。虽然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但由于这个宪法颁布后不久被就束之高阁了,宪法所规定的制度运行不久就陷入了不正常状态。为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尽快实践共产主义,1958年,志在实现工农商学兵一体、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农村全面展开,于是,人民公社彻底替换了宪法所规定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的造反派力图在城市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来代替城市的国家政权。虽然城市人民公社没有全面确立起来,但所有的城市政权都被“革命委员会”替代。^①“人民公社”终于打碎了国家,从而使得实际中存在的国家确实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是,这不是基于现代国家的发展,相反,而是基于现代国家的不发展,因而,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出现,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退步,其留给中国的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现代化的国家建设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落后国家要迈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作为人类历史运动而存在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核心就是人的独立与解放,并由此诞生出现代社会。我们可以让现代社会从产生到发展都直接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但不能因此而取消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遵循这样的理论,那么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运动起点就应该是现代化,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实践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中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强调俄国的发展应该从战时共产主义回到国家资本主义。^②中国也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重新定位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初级阶段,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建设重新起航,其出发点是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化,而不是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③

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其根本在于对社会主义有了重新认识,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对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中,中国将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自身运动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来把握和审视,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明确了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明确了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是社会主义实践保持勃勃生机的

①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0、210—211页;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转引自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43页。

② 参见《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邓小平认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见《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

根本。理论上的清醒带来实践的科学和发展的有效,从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的国家建设回归到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来,因为,这条道路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开辟了三大动力资源:一是现代社会,二是人类文明,三是中国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国家建设确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在实现劳动阶级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了包括劳动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与解放。^②这种解放不仅体现为人们从归属单位组织的“共同体”人转变为直接归属社会的“个体人”,并将自古以来形成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合一的社会交往方式,改变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二元分化的社会交往方式。与此同时,人们拥有了属于个体的“纯粹私有财产”^③,2004年修订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纯粹的私有财产”与个体的独立共同孕育了现代社会,从而使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真正的前提,获得了其自身发展应有的内容。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有现代国家与之相适应,以保障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建设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国家对自我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以保障人的自由,为此,必须要实现国家的全面法治化和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④。二是国家对社会中每个公民的权利及其现实生存的维护与保障,以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平等。为此,国家必须在维护市场经济体系健全与发展的同时,在社会领域健全保障每个个体拥有最基本的自给自足的生存能力与生活条件的制度体系、资源体系和管理体系。这两个根本要求将深刻地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从而改变国家的权力组织与运行方式、政府的职能结构与运行方式以及国家治理结构等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统一,在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吸收人类文明成就的同时,为人类文明尤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场历史运动,虽然起始于西方,但不是来自西方;虽然西方最先展现了现代化的特性与规律,但这些特性与规律不属于西方。然而,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对立起来,在简单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排斥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的基本规律。结果,社会主义的实践变成与人类文明发展渐渐疏离的过程,冷战的铁幕使这种疏离最终变成了隔绝。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正是这种疏离与隔绝,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内在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觉与主动地融入世界,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学习人类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正是这种学习和互动,使得中国能够以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来把握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使其融入全球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建设强调学习和吸收,反对照抄照搬,因而,中国与世界、与人类文明互动的过程,是国家建设遵循规律性、保持主体性、发挥主动性、创造互惠性的学习、吸收和贡献的过程,是将中国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相协调、相统一的过程。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林尚立:《民主的成长:从个体自主到社会公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9页。

④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最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这样大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而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持续的动力。改革开放 30 年的实践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发展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 二是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自我生存与发展问题。国家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国家的稳定和进步是国家建设的根本保障和动力所在。正是基于中国的发展, 同时也正是为了实现中国更好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发展的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 从而使中国的国家建设由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布局发展为“四位一体”的布局, 即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基础上, 加上社会建设。这个变化不是国家建设内容的增加, 而是国家建设整体形态的变化, 即国家建设不仅仅在于维护政权、巩固制度, 更重要的在于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创造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治共同体、一组规范民主的制度体系和一套深入人心的核心价值。因为, 社会建设的提出, 在表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已出现二元分化的同时, 也表明国家作为被社会决定的力量将全面承担起保障社会、维护个体、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使命。所以, 可以这样说, 中国的国家建设将因社会建设的提出而全面步入整体建设、规范发展和有序推进的发展时期。有了这样的国家建设, 中国就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结 语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等同起来。不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还是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来看, 现代国家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其逻辑起点和行动依据都是现代化。现代国家建设是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维度, 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没有现代化的发展, 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根本保障。现代化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历史运动, 有其内在的规律与逻辑; 社会主义是人类在现代化发展基础上所追求的更高社会形态, 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来引导现代化的发展, 但不能用超越现实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来替代现代化的现实运动。中国的国家建设历程证明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范畴中, 社会主义国家是新型的国家, 换句话说, 是完成现代国家之后的国家, 用恩格斯的话说, “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个理论对发达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有直接的意义, 其现实基础就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 包括现代国家的建设。然而, 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来说, 其建设和发展不能由此而放弃“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建设, 即现代国家建设; 至于其发展社会主义的努力, 则可以通过赋予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取向来体现, 例如通过现代国家建设, 在制度形态上实践大多数人的民主, 从而达到人民民主。

现代化——现代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与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和行动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比较清晰地展现了这个发展的规律与过程, 并用自身的经验与教训证明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中国实践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中国从自身立场出发所进行的探索和总结, 对社会主义的事业, 对人类的现代化发展都将是一种贡献。

责任编辑: 王永平